

点“碳”成金 碳金融助力经济绿色转型

文/赵炼

2020年9月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双碳”战略发展。在此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向“净零排放”全面转型的基调已经形成。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正式开市，作为国家实现“双碳”战略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碳市场对于国家利用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碳金融”作为活跃碳市场的重要产品，其发展的活性对于碳市场的健康运营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碳金融的定义

碳金融是指以碳排放权作为标的物，通过碳市场实现碳排放权的购买和出售，从而实现碳排放控制的直接或衍生金融活动。从产品谱系上看，碳金融产品主要分为交易工具、融资工具和支持工具三大类。

其中，交易工具主要包括碳期货、碳期权、碳远期、碳掉期、碳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工具主要包括碳质押、碳回购和碳托管等；支持工具主要包括碳指数和碳保险等。

2021年7月，中国投资协会在其发布的《以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的投资机遇》中提到：未来30年，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在能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规模将会达到100万亿元，其中以新技术新能源为代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并会撬动70万亿元的绿色基础设施

金融机构在进一步加大传统绿色信贷投入力度，努力支持实体企业进行绿色投资、发展绿色技术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发展碳债券、碳保险和碳基金等活跃性更高的基础金融产品以及碳期权、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工具，在拓展碳金融市场交易范围的同时，也可以在碳市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金融产品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的重要作用。

投资。

碳金融几乎覆盖了碳排放权的各种交易方式，在未来将有着巨大的发挥作用空间。能否打好碳金融这张“功能牌”，对于我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来逐步落实经济体系的绿色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碳金融对于绿色转型的影响

碳金融可以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资金配置。为实现减排环保的目的，碳市场通过设立碳排放权的方式将“碳排放”这一抽象概念资产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减排问题具体化。“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预示着未来我国碳减排市场将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而作为实现碳减排重要金融

工具之一的碳金融产品会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低碳领域，从而帮助我国整体经济市场在绿色转型期间可以实现更有价值的资金配置。

碳金融可以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风险管理。“风险规避”本身就是金融的重要作用之一，而将金融与碳排放相结合则可以增强碳金融相关产业的风险管理韧性。此外，碳保险以及部分碳金融衍生产品除了帮助市场参与者弥补风险损失外，还可以通过引入资金供给方、增加市场参与者被关注度等方式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增强对参与者的监督管理，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碳金融可以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市场定价。碳金融可以为碳市场引入众多金融机构及外部市场的其他机构投资者。相比于碳市场，金融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具有相对完备的交易规则和监督机制，因此金融机构参与者的加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碳市场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这也就会使得碳金融产品可以在买方卖方的市场化均衡博弈中及时确定自己的价格。而由于低碳领域的其他相关投资项目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形成明确的价格体系，因此众多碳金融产品的出现在激活碳市场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低碳经济转型领域的其他相关投资主动发现价格。

我国碳金融助力绿色转型经济范式变革中存在的不足

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是在

2017年才开始试点，相关碳金融产品的设立也处于尝试阶段，其在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不足：

碳金融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目前，我国金融领域还没有具体针对碳金融的细则文件出台，这与碳金融市场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后果就是：我国各地区对于碳市场的准入门槛高低不一，市场参与者的资历和素质良莠不齐，部分金融系统并没有建立起完全适应碳金融的融资结构，碳金融产品的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也不尽相同、参差不齐，参与者的市场主体行为也无法被有效约束。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尽管相继出台了碳金融的支持政策，但是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对于碳金融的潜在价值、发展机遇、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以及交易规则都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综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及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部分参与者在投资低碳项目后短期所获得的收益难以维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营，同时政府的成本补偿也没能及时到位，这就使得部分碳金融产品不但没能起到杠杆作用，相反还造成了部分企业的破产倒闭。

碳金融产品的支持力度和创新程度不够。碳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产品，无论是对于金融机构还是实体企业而言，其所带来的盈利能力仍然有待评估，因此许多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对于碳金融产品的尝试都是“点到为止”。例如，尽管众多大型商业银行都打出了“绿色信贷”或“低碳基金”的招牌，但其所投入资金规模在其总资金规模中只占较小比重；其对于二级市场建设以及碳金融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力度更是明显不够。此外，我

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碳金融产品主要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初级信贷为主，保险公司、担保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并没有积极参与到碳金融产品的建设中，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更是十分有限。这也就使得我国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较为单一，缺乏更为活跃的保险、基金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制约了碳金融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市场定价效率，其作为金融工具本身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缺乏碳金融专业人才。碳金融是一个交叉领域，其中“降碳”是目的，“金融”是手段，要想利用好“金融”来实现“降碳”的目的，就需要一批同时掌握金融手段并且对环境保护知识有着充分了解的人才参与到碳市场的建设中。而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碳金融学科，碳金融行业人才缺口较大，现有的从业人员大都是转型而来，专业技能普遍不强，从而制约了我国碳金融产业的纵向发展。

对我国碳金融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建议

针对碳金融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目前在碳金融领域存在的不足，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构建针对碳金融产品的统一管理制度和交易规则。我国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于碳市场的管理，以法制化为前提，来保障碳金融产品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国家应制定统一的碳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并在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和违规处罚等多方面给出明确的市场运行细则。

加大对碳金融产品发展的支持力度。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級政府在制度上应该加大对碳金融工具的扶持政策，如：设立转型碳发展基金、提供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补贴，以及将碳金融发展纳入机构评价体系等，积极为碳金融产品的投入市场和创新发展开通绿色通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除银行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资本的介入，充分发挥保险、证券、基金以及信贷公司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碳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此外，金融机构在进一步加大传统绿色信贷投入力度，努力支持实体企业进行绿色投资、发展绿色技术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发展碳债券、碳保险和碳基金等活跃性更高的基础金融产品以及碳期权、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工具，在拓展碳金融市场交易范围的同时，也可以在碳市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金融产品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的重要作用。

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立专门的环境与金融交叉学科来为碳金融领域输送专门人才。可以考虑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从增强学生实践技能的方向对人才进行培养。此外，还应该针对碳金融设立专门的门槛考试，从而帮助碳交易市场进行人才筛选，保证相关从业人员在正式从业之前都进行了交叉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相关技能的培训，为构建一个成熟的碳金融市场、更充分助力绿色转型的经济范式变革准备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该文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才青年学术基金项目“金融在碳中和中的支持作用”的阶段性成果。

准确处理各方关系 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文/秦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他指出“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雄安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决定其建设和发展需要缜密的规划和严谨的设计，需要对各种问题有清晰的判断。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应重点处理以下关系。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雄安建设起步阶段从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向区域乃至全国增长极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集聚，而雄安并不具备吸引资源自然流动的天然优势，企业、高校、行政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很难自发迁入，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也很难自动流入。雄安新区建设肩负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京津冀城市群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需要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的推动和引导、中央政府的协调以及

雄安新区建设将逐步改变北京对区域资源的单向吸附，作为北京首都功能的拓展区，雄安新区根据自身创新发展规划，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优势资源，从而形成首都圈内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核心城市。雄安新区对于天津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地方政府的配合。

当然，政府的引导在城市建设初期具有重要意义，但政策红利不能持续地保障雄安的千年发展，应逐步培育自身发展动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是在雄安新区具备一定规模和自生能力之后所经必由之路。政府应该扮演发展引导者和市场服务者的角色，推动创新成为雄安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业态创新等。探索制度创新不仅是雄安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总体方向，力求政府小规模、少层级、小机构、宽职能、严执法、大监督等，逐步实现市场机制维护者、服务者的角

色转变。

战略目标间的关系

中央指出雄安“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前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为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案，后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探索创新发展道路。两项任务都非常重要，“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增长极，雄安需要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流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通过继承北京优质资源，进而形成自身产业，属于北京对雄安的“输血”过程，而探索创新发展的“雄安模式”是自身“造血”过程。雄安新区不是京、津同城，不能依托两地的发展而发展，践行创新发展道路的雄安是绿色、现代的智慧城市，尤其机制体制创新，使雄安成为创新氛围浓厚，城市充满朝气，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极佳的现代化新城。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北京疏解的资源留住，并吸引全世界的智慧资源，进一步实践创新发展，这也是雄安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疏解与承接的关系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有明

确的自身定位，并非北京疏解的就是雄安需要承接的，而应根据“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四大功能定位有的放矢地作出选择。

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央企总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高耗能产业以及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批发市场等第三产业不在雄安发展定位中，都不应接收。相反这部分产业对于河北其他地区发展区域物流和商品集散产业，解决密集劳动力就业有很大帮助。北京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市场已被疏解至环北京地区，不仅分散北京过重的非首都压力，也可以保证对城市生活、生产的有效供应。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应该是雄安重点承接的部门，雄安打造创新之都，不能缺少科研单位的支持，不仅应该承接，雄安还应该想办法吸引更多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单位入驻。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也是雄安稀缺资源，是留住人才的前提和保证，应该重点承接。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是雄安作为国际开放城市，发挥对外合作、交往所需部门，企业总部是现阶段雄安获取企业资源最有效途径，通过央企的整体进入或总部进入，雄安可以快速地建立起自身产业体系，从而发展高端高薪产业。

雄安与京津冀的关系

雄安新区建设肩负破解京津冀三地发展中遇到的协同瓶颈，通过在京、津两城之外，于河北腹地设立雄安新区，平衡

区域间发展差距，创新机制体制，协同各方利益，有序实现京津冀共同发展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雄安新区建设将逐步改变北京对区域资源的单向吸附，作为北京首都功能的拓展区，雄安新区根据自身创新发展规划，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优势资源，从而形成首都圈内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核心城市。雄安新区对于天津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方面，雄安新区建设势必会影响天津对资源的集聚效应，从而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却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

另一方面，两地比较优势与功能定位均存在差异，天津定位为高新科技研发转化基地、中国北方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北方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北方第一自贸区。天津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可以建立互动关系，利用沿海港口优势，以及国际物流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天津将是雄安新区今后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通道。雄安新区对于河北而言，是一次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契机，以雄安为牵引的河北各地区参与到京津冀协同战略，打破了之前资源向京、津两地倾斜的格局，对于河北提升产业结构具有积极意义。雄安新区不仅吸收了北京的优质资源，还通过创新发展，实现自身的内生动力培育，带动河北其他地区发展。

雄安与通州的关系

虽然都具备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任务，同为北京

发展的两翼，但雄安新区与通州有着明显不同的定位。首先，雄安有着高于通州的战略定位，它不仅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承载地，更是“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创新发展实践区，是探索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区，肩负实践“中国梦”和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重要支点城市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都是通州所不具备的。其次，雄安是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是首都功能的拓展区，不仅承接非首都功能，也需要承接部分首都相关部门和产业的进驻；而通州是北京行政副中心，更多的是对接北京行政中心及城市功能的转移。再次，通州是北京副中心，是北京的一部分；而雄安新区是和北京、天津形成差异化发展，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眼光、世界标准的高规格现代化新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城市。

因此，雄安和通州在产业选择和城市功能定位上有显著差异。首先，雄安新区应该更加突出首都拓展区的定位，承载国家行政、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部门的进驻；而通州则应该主打北京城市拓展区这张名片，从建设运河CBD和文化中心入手，打造商业核心区和文化产业功能区。其次，雄安作为独立发展的城市，不仅要承接企业入驻，而且要承接央企总部或央企整体入驻，同时配套教育、医疗等国际一流的优质公共服务系统，建设能够吸引要素集聚的反磁力中心；通州则不需要明显的反磁力功能建设，而是应该和北京形成一体，通过打造北京“后花园”和“休闲区”以吸引北京居民来此工作和生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辑